

两种文化之间的生活

► 任之恭

我成长在中国贫穷的乡村，那里生活简朴而艰辛。我们山西省，正如名称所显示的，是个多山的省份，据说山峦的坚硬不屈的特性也反映出该地区人民的本性（既好也坏）。山西人直率、勤奋，当然我也得承认，以能吃“醋”和把钱抓得紧而闻名。这也许是对的，童年时我就吸取了我们本省人的特性。当然我喜欢醋。

（与我相反，妻子葆怪根本不喜欢醋。她来自中国南方的无锡，甚至比一般南方人更甚，她极其敏捷、能干；我将她比作南方的河）。同时，我憎恨浪费，特别是水。我的家人发现这很滑稽，比方说，至今，在洗盘子时水龙头开着，我就会感到很不舒服。

我第一次到美国，开始于1926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持续读了7年书，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西方文化。来自一个有丰富文化遗产而社会和政治结构却极其脆弱的国家，我对西方的哲学和政治制度特别感兴趣。

“五四运动”之后，我在中国听到许多这方面的事情，来美国后，我被实际亲眼看到的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观念深深地感动了。我钦佩大多数民主理想与制度、司法

体制和美国政府的预算平衡结构——这个国家最好地体现了林肯著名的宣言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各个方面。

1933年我回到中国，在一所流亡大学教了8年书。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我们有明确的目标，祖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鼓舞着我们。最终的胜利将中国从外国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炮舰与“租界”时代的人来说是值得作任何牺牲的奖赏。

1945年，我第二次来到美国，妻子和孩子们1947年前来与我团聚。我们本打算短期停留；为了减轻离别的痛苦，妻子实际上告诉她父母，她只走1年，而不是我们预计的2年。我在哈佛重新学习之后，1949年我们打算回国。1949年革命的动荡阻止了我们愿望的实施，1950年我开始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工作，把家也迁到马里兰州的银泉。那是一段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时期：葆怪还记得有好几年我坚持不肯买电子钟，因为我认为回中国后不同的频率下它会毫无用处。但我们买了一个极好的短波收音机（大约花了200美元，当时算是一大笔



任之恭（1906.10.2 ~ 1995.11.19），出生于山西省沁源县，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赴美留学。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担任教职并进行研究工作。

钱了），以为回国后它作为一种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工具是会很有用的。可是事情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进展，1955年我和妻子都成了美国公民。

我曾试图去理解我所知的两种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在我形成性格的年代，直到我20岁去美国，完全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可以说我在许多方面是儒家教育的产物，尽管我对儒家思想的感情是复杂的。由于儒家思想基本上是种伦理道德，它教导仁（特别是，德性与善行）与义的原则。这些教诲铸成了我的道德特性，而且我很自豪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诚实正直于我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另一方面，儒教又是中国社会中许多我认为应该反对的东西的根源。它强调生活的实用问题而忽视“精神”的问题。它体现和加强官僚作风的理想，它因为支持现存的秩序，压制了独立与创新。以我的一生为例，我谴责儒家的社会等级观念，宣称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也一贯批判传统中国人对“面子”与“仪表”的过分强调。我宁愿粗鲁而不是虚伪，有许多许多次，有人说了或做了什么我觉得讨厌的事，家人就会因为我所造成的吵闹、难以控制的“场面”而惊慌。

西方文化有许多令我崇尚的地方，也有许多我并不喜欢。这里赞美个人的力量与个人神圣不可侵犯，我内心深处对此反应强烈。（我最喜欢的戏剧之

一是埃德蒙德·罗斯丹 Edmund Rostand 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在其美妙章节中，英雄显示出其个性的骄傲。）而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对我则是全然可鄙的，而最近这些年最令我痛心的是中国青年对这许多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吸收。它使我回忆起年轻时中国“崇洋”思想这种不健康时尚的恶果，那时新的、好的东西命名时前面都要加上“洋”字，就像把火柴叫作“洋火”。半个世纪在美国的生活并未削弱我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感，年轻时，我见到我的祖国在列强的侵略与占领下屈膝。当我看到其他国家像越南在 60 年代面临着同样的威胁，旧有的愤怒又回到我身上，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就是更多的辛酸。我认为帝国主义

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之一。

带着这样一种忠诚与感情的混合，可能会有不一致的情况，但妻子和我试图从中西方文化最优秀部分结合起来的优势出发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为了例示这种“两面”教育的一个微小细节，我们四个孩子都既有中文名字，又有英文名字。峻明出生的时候，葆桢和我请她的父母按习惯为她取“中”名（一个中国字，所有弟弟妹妹的名字都用这个字）葆桢的父母取了“俊”字，习惯上与女性的美貌相关联。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中名，只是将富于女性特征的人字旁换成了一般较男性化的山字旁。孩子们看来很珍视我们的努力。现在成年了，她们还记得童年时我试图给予她们的我曾接受的教育方法。按她们的说法，如果我发现她们将学



叶剑英在北京会见任之恭



1983年任之恭夫妇与张维、陆士嘉合影

校的铅笔带回家里，或者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我都会大发雷霆（我自己已不记得了）。她们四个人都声称曾在不同场合讲过有关我与不诚实和放纵行为作斗争并取得成功的故事。她们最喜爱的一个是：有一次，作为一条规矩，我拒绝去饭店吃饭，因为没带足够的钱。恰巧我带着中国学生会的经费，因为我是该会的司库，尽管我一回家就马上可以补上，我仍然不肯“借”50美分。

虽然女儿们都在美国长大，她们对中国却有着强烈的眷恋之情。儿时教育的结果，使她们尊敬并珍视她们的中国传统。她们可以和我一样背出中国的社会等级：“士、农、工、商”。当谈到要做出反抗潮流的决定时，她们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我曾再三重复过的成语：“随波逐流”。无论是否是机缘使然，我们的四个女儿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并献身于各自的专业（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医学和数学），这可能部分地反映了我对自然界的爱好和好奇。她们四个人现在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 峻明，1962年5月5日与化学工程师顾屏山（George Koo）结婚。他们有3个孩子：丹尼斯（Denise），1989年5月21日与马克·歌德史密斯（Mark Goldsmith）结婚，道格拉斯



1974年夏，吴有训及夫人王立芬（左2）在北京寓所与赴美多年的任之恭（左1）夫妇重聚。

（Douglas）和阿利莎（Alyssa）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芒廷维尤（Mountain-view）。

- 峻玲，1967年10月28日与生物化学家刘易斯·雅科布森（Lewis Jacobson）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拉里萨（Larisa）和阿列尔（Ariel），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

- 峻斐，1979年1月7日与心理学家罗伯特·施劳赫（Robert Schlauch）结婚。他们有3个孩子：迈克尔（Michael）、丹尼尔（Daniel）和艾米（Amy），住在麻萨诸塞州的尼丹姆（Needham）。

- 峻瑞，1986年9月14日与物理学家乔治·兹（George Zweig）结婚。他们住在新墨西哥州的埃尔·兰科（El Rancho）。

我们是个十分亲密和幸福的家庭，而且人口在一年年增长。

科技推动文明进步

在美国生活大半辈子了，我已经形成了对西方文化中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惊人发展的巨大敬意。确实，我很久以来就非常羡慕开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随后出现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些思想运动。另一方面，当我回顾我的祖国——中国，近几百年来在这些方面的落后时，感到极大的痛苦。中国的科学技术多少世纪来都十分卓越，然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却奇怪地停滞不前了。其原因可能同封建的社会结构和儒家信仰的保守性有关。不论过去落后的原因如何，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处于优先地位。

当然，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在科学方面有起有伏的唯一例子。在我自己的专业生涯中，对于美国科学地位从开始上升到后来又扯

平，我是一个抱有兴趣的观察者。我在20年代到美国时，正值科学研究的种子在这个国家开始发芽。由于30年代初的动乱，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在他们之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最杰出的——从欧洲移居到美国。结果，美国科学的秧苗成长为一株昌盛的大树。这个国家的土壤确实肥沃，不到半个世纪，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新中心，取代了旧中心德国、英国和法国。美国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同科学上的成就一道，巩固了它作为西方世界领袖的地位。值得回忆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国家研制出了雷达和核武器——这两种技术为同盟国赢得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战后，又取得了各种技术创新，包括半导体装置和引起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计算机。登上月球这件事也许是研究和发 展使美国领先世界的最好例子。可是，近年来，其它国家（它们之中日本为最）的经济力量增长到了新的高度，它们向美国的优势地位挑战，而且在许多方面破坏了美国的优势地位。在科学研究方面，欧洲的国家已经有一大部分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在某些方面已经赶上或者超过美国。例如，在日内瓦为一个欧洲财团管理的一个研究组织“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CERN）经过

许多探索，终于发现了基本粒子 W_{\pm} 和 Z^0 。另一个例子是新近的发现——还是在欧洲的研究实验室——一种崭新的高温超传导性材料。实际上，许多美国科学家选择去欧洲专职工作或兼职工作就是这种改变了的情况的明证。

这些年我始终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国际上美国和其它当代超级大国的争论。美国用了将近10年（1966~1975）在越南打了一场战争，声称这样做对它的国家安全是绝对必要的。我觉得这种说法不能接受，因为越南是一个小国家，在地球上几乎正好在美国的另一端，越南的南北方之间的冲突，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似乎不干美国的事。我只能相信美国是在行使帝国主义的霸权，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政府的这些行为，我是极度反感的，而且在越战期间我也积极参加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反战抗议。越南战争的错误不应该再重复。然而，越战以后的年代里，美国一再将其战线拉长。格林纳达（Grenada）、的黎波里（Tripoli）、巴拿马（Panama）以及波斯湾（Persian Gulf）等战事都是美国不顾后果滥用军事力量的危险例证。

历史学家鲍尔·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写的《超级大国的兴衰》（兰德姆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中评论说，“美国现

在正在冒险，正像研究以前的超级大国的兴衰史的历史学家所熟知的那样，美国的所作所为也许可简称为帝国的过分扩张……”所以应该注意这种非常严肃的警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最后我想就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谈谈看法。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对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是重要的，对两个国家来说尤其互惠。美国对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提供巨大的帮助，中国能够支援美国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经济上，中国给美国的产品提供了最大的消费市场。持续良好的关系，不论是近期还是长期，对两国都是有利的。

……

对于将来我的希望是什么呢？在我年轻时，中国人民象“一盘散沙”；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文化停滞、社会混乱和政治腐朽中浪费掉了。我打心底里高兴，在我有生之年看到这个国家“站起来”了，变成了统一、强大、繁荣的国家，并且进入现代的科学和技术世界。我相信文化的根基是足够健壮的，人民的性格是足够坚定的，能够使国家从挫折中恢复过来，并在各方面继续前进，那将使我们骄傲地称它是我们的祖国。

【本文节选自《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